

俄藏敦煌文献所见存世最早的《史记》写本残片及其缀合

张宗品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内容摘要 俄藏敦煌文献中已知与《史记》相关的残纸共有五件。除此之外,笔者又发现未命名的俄藏Дх.04666残片亦为《史记》写本,并可与俄藏Дх.02670残片相缀合。二者为迄今所见存世最早的《史记》写本的遗存,它对我们了解早期北方《史记》写本的形态及宋刻本的不足多有启益。

关键词 《史记》;敦煌文献;写本

中图分类号 K870.6;K8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06(2011)05-0073-04

On the Earliest Fragmentary Manuscripts of the Shiji (Historical Records) among the Dunhuang Documents Kept in Russia

ZHANG Zongp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100871)

Abstract: There are five fragments of Shiji (Historical Records) among the Dunhuang Documents kept in Russian. In addition,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discovered that Дх.04666 is also a piece of manuscript about Shiji, which can be joined together with Дх.02670. As the earliest texts of Shiji, they both are helpful for understanding the early northern version of Shiji and the block-printed edition in the Song dynasty.

Key words: Shiji (Historical Records); Dunhuang document; Manuscripts

俄藏敦煌文献中已知与《史记》相关的残纸共有5件,分别为Дх.02670、Дх.2663、Дх.2724、Дх.5341、Дх.5784^[1]。除此之外,笔者又发现未命名的俄藏Дх.04666残片亦为《史记》写本,并且可与俄藏Дх.02670残片相缀合。这是迄今所见存世最早的《史记》写本残片,不仅可帮助今人窥见《史

记》早期写本的风貌,更可校正《史记》文本的讹误。

一 录文及缀合

俄藏敦煌文献Дх.02670《史记》残片,孟列夫主编《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中著录为第2840号

收稿日期 2010-12-24

作者简介 张宗品(1979—),男,安徽霍邱人,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古文献学。

Дх-2670a^①。写卷为《史记·李斯列传》正文,无题字。背面为《高昌国史》(揖王入高昌城事)。尺幅为12×8cm。以文字位置推测,所存当为纸页中部残片,纸面有乌丝栏,纸色微黄而质地较厚^②。共6行,可辨认者26字,另有数字仅可见残余笔划,书风介乎隶书与魏碑之间^③。

录文如次:

(前缺)

- 1 ……且二世之治……
- 2 ……也□ (1)忠臣□ ……
- 3 ……非不谏也而……
- 4 ……□ (2)器有数言(3)……
- 5 ……于利民(4)□ □ ……
- 6 ……□ (5)弟不顾其□ (6)……

(后缺)

(1)该字左半残缺,以字形及今传本推断,当为“杀”字。

(2)此字只可见中间一竖后半,以今传本相校,当为“车”字末笔。

(3)“言”字略残,今本作“宫”,“宫”是。

(4)写本中“利民”,南宋黄善夫本及诸传本作“民利”^④。

(5)残存部分为“昆”字下半。

(6)残存部分似“然”字之上半,又或为“咎”字上半,不能确定。

俄藏 Дх. 04666 残存三行半,仅有编号,无拟题^⑤,收于《俄藏敦煌文献》第11册,无其他相关著录。保存状况不如俄 Дх. 02670《史记》残片,字色较淡,似乎经过水洗。

录文如次:

(前缺)

- 1 ……有节车(1)……
- 2 ……而有益……
- 3 ……逆于□ (2)? ……

(后缺)

(1)“车”字残下,与俄 Дх. 02670《史记》残片第4行“器”上残存竖划正相接。

(2)此处残存“昆”字上半,与俄 Дх. 02670《史记》残片第6行“弟”上残划正相接为“昆”字。

经比定,该残片与 Дх. 02670 残纸字句相接,尤其是两残片的“昆”、“车”二字笔划相接,几乎不爽毫厘,为 Дх. 02670 残纸第4、5、6行上部。两残片

书风、笔迹十分相似,其中重复字对比略见下表:

相同字	有	而	于
俄 Дх. 04666			
俄 Дх. 02670《史记》			

今检《史记》卷87《李斯列传》,相关文字如下,拼接后写本中的所有文字以黑体标出:

……且二世之治岂不乱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杀忠臣而贵贱人,作阿房之宫,赋敛天下。吾非不谏也,而不吾听也。凡古圣王,饮食有节,车器有数,宫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费而有益于民利者禁,故能长久治安。今行逆于昆弟,不顾其咎……^⑥

二 残片形制及时代判断

俄 Дх. 02670 残纸所存字迹较 Дх. 04666 为多,每行约有整字5字,前4行字距较小,后两行字距较疏。将残片与南宋黄善夫本相比照,前4行实际字数约每行18字,后两行实际约每行16字。以最宽处(8cm)约5字算,则所用纸高约为25—26cm,残片横长12cm,共6行半左右,则行宽约1.8cm。此前,藤枝晃教授在《汉字的文化史》中“卷子本的尊严”部分提到标准的卷子本书籍的形制:“书籍的大小为纵长25—26cm,这在当时正好为一尺。尽管后来一尺的长度延长到了30cm左右,但写字用的麻纸的长度依然相当于过去的一尺。”又称“尽管纸是各种各样的,但用来制作卷子时在外须先在上面画线。上下事先预留3cm多的空白,然后上下各画一条横线,其后以1.5—1.8cm为间隔画出竖线,竖线与竖线之间为一行,每行书写17个字。这种形式最终得以确定下来大约是在公元5世纪下半叶,而此前上下预留的空白较窄,字数为16个,或为18—19个。”^⑦根据藤枝晃的相关研究,这两片残纸的形制正是大约5世纪下半叶之前写本的典型特征。孟列

① 孟列夫、钱伯城主编《俄藏敦煌文献》第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26页;又参见《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第2840号 Дх. 2670 a 孟列夫主编,袁席箴、陈华平译《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62—463页。

② 施萍婷先生在《俄藏敦煌文献经眼录》(二)中著录为29字,但其余或只略见笔划一角。《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17页。

③ 此处笔者原误认作“判民”,承廖可斌老师指正,谨此致谢。

夫氏推断为4—5世纪写本^[2],我们认为大致可信。

此外,残卷文字有浓重隶书意味,尤其以捺笔最为肥厚。书风与之最为相近的早期史书写本有两件,一为1924年新疆鄯善出土的《三国志·吴志》残卷^①,一为1965年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写本《三国志·孙权传》残卷^[6]。郭沫若认为,前者当为东晋写本,后者当为西晋写本^[6]。但与二者相较,此残片在结字用笔上又有明显的北碑意味和楷书化的特征。三件残卷用笔十分相近,但在字体上又有不断楷化的趋势。俄藏《史记》残片所存字迹,更具逐步强化的北方书体的特征,乃至与后来的北方碑体书风有着某种演化的必然性。

虽然该残片确切的出土地点已无从考订,但现存俄藏敦煌文献来源约有三批:一为C·Ф·奥登堡率领的俄国西域考察团1914—1915年搜集到的;一为当时俄国驻乌鲁木齐领事H·H·克罗托夫和1906—1909年间前往和阗的C·E·马洛夫考察团所收集;一为1909—1910年前往吐鲁番的C·Ф·奥登堡考察团搜集^[7]。这三批俄藏文献的获取时间都在鄯善及吐鲁番《三国志》残卷出土之前,因此不可能有据之作伪的嫌疑^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史书文献的出土地域都不出北凉(397—439)范围,而相关史书文献的形态特征也基本与这一时间段相符。因此,我们进一步推断,残纸或为北凉时期写本。

此前公认的最早《史记》纸写本为日本石山寺藏《史记集解》本《张丞相列传》与《酈生陆贾列传》两残卷。虽然前人对这两件写本的抄写时间判断不一,但其上限则为罗振玉、贺次君所持的六朝^③。而其中字形已经是很成熟的楷体,写定时间也应已接近隋唐。如此,则俄藏Дх. 02670及Дх. 04666残片较石山寺旧藏要早近两百年,无疑是目前所见存世最古的《史记》写本^④。

三 俄藏敦煌残纸与《史记》文本

贺次君先生称:“《太史公书》自西汉宣帝时已宣播于世,以流播既广,传抄日多,字句之间,差误特甚,故裴骃《集解序》称‘考校此书,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辨其实,而世之惑者定彼从此,是非相贸,真伪杂糅’,盖自魏、晋时已然,宋以后之刻本无论矣。”^[8]残片虽存字寥寥,但零璧碎金,对校正今本不无启益。如残纸“官”字虽讹为“言”,但无心之误,易于明辨。且其中不乏可发千古之覆者,如俄藏

Дх. 02670中“无益于利民者”,自宋刻本以下皆作“无益于民利者”。乍读之下似乎“民利”更符合今人的语法习惯,然通检《史记》本书,“利民”凡数现,而作“民利”者,仅此一例。作“利民”者如:

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孝文本纪》)

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议之也。制国有常,利民为本;从政有经,令行为上。(《赵世家》)

上笑曰:“夫相国乃利民!”(《萧相国世家》)

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商君列传》)

①收于罗振玉1918年影印的《汉晋书影》。书首序文称“至晋人诸迹,乃东邦大谷光瑞伯所藏,其书体皆古肥,乃钟张之绪余”。书中又收有西凉建初七年《妙法莲华经卷一残纸》,书风亦属“古肥”。今中华书局《三国志》前亦有该书影,较《汉晋书影》多首行四字,题“东晋写本《吴志》残卷”,共8页。见(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1册附页1—8。

②虽然藤枝晃教授认为1911年以后日本大谷探险队、斯坦因、奥登堡都曾买到伪卷,但1997年在英国图书馆中文部召开的“二十世纪初叶的敦煌写本伪卷”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英国的韦陀(R. Wiltfield)、法国的戴仁(J.-P. Drège)、俄国孟列夫(Л. П. Меншиков)以及中国的荣新江教授均对藤枝晃和石冢晴通教授的观点提出异议,并讨论了一些20年代以后出现的真正伪本。参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54—356页;荣新江《“二十世纪初叶的写本伪卷”学术研讨会简介》,《敦煌研究》,1997年第4期,第179—182页。

③罗振玉《古写本史记残卷跋》,见《海东古籍丛残》(二)书末跋称“(残卷)书迹皆清劲……均千年以前写本也”。贺次君先生以为六朝写本,见贺次君《史书记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1—8页。日本学者近藤正斋(1783—1841)于《正斋书籍考》中认为抄于天平年间(729—768),神田喜一郎在《容安轩旧书四种解说》中称之为见存《太史公书》最古者,但定为唐人手述,水泽利忠氏在《史记之文献学的研究》中将之界定为720—949年,张玉春教授断定不晚于唐初。参见张玉春《版本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9—61页。

④纸写本之外,另有汉简本《史记·滑稽列传》之《淳于髡传》,残存31字。英国斯坦因(St. ein)发掘,沙畹(Chavanes)本原简号T. vi. b. i 301。见民国三年(1914)上虞罗氏宸翰楼《流沙坠简》三“简牍遗文”页2a,“简牍遗文考释”部分,页2b。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第8册图版206亦收之,东京: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刊行会,昭和三十三年三月。另有张凤影印《汉晋西陲木简汇编》收之,民国二十年(1931)上海有正书局影印本,第7页。

复检先秦旧籍,所见“利民”者比比而在:

晏子曰:臣闻明君必务正其事而利民。(《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十九)

其于利民一也。利民岂一道哉!当其时而已矣。(《吕氏春秋·爱类》)

圣王通士,不出于利民者无有。(《吕氏春秋·爱类》)

上思利民,忠也。(《左传·桓公六年》)

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就语义而言,《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爱类》以及《史记》本书所用文例,皆与此文语境甚为相合。而《吕氏春秋》的用词与此句尤为相似。就语法角度而言,《吕氏春秋》中亦为“于+利民+者”的结构,在《史记·赵世家》中“利民”也是作名词性结构使用。结合语义和语法两方面,我们甚至大致可以推知《吕氏春秋·爱类》篇,乃此句出处。这不仅与太史公为李斯作传时所需参考的文献相合,也与作为秦相的李斯的身份、处境乃至知识背景相一致。传世刻本中,号称精校的宋本亦作“民利”,而此条足以正宋本之讹。

值得注意的是,俄藏 Дх. 02670 及 Дх. 04666 残片以及此前出土晋写本《三国志》残卷抄写工整,笔划精工,且无批校痕迹,应为当时的精写本,这与此前发现的两件晋人写本《三国志》的情况也十分相似^[9]。这些写本在当时还较为珍贵,甚至有可能不是私人化的物品,不可随意批点。《魏书·高昌传》载,直至北魏正光元年(520)时,高昌王曲嘉“自以为边遐,不习典诂,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变以为博士,肃宗许之”^[10]。可见当时的北凉一带,经史书籍尚不易多得。

俄藏《史记》残片与此前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皆为白文无注本,而此前发现的《史记》两件六朝写本俱为《史记集解》本,一为《史记·张丞相列传》残卷,一为《史记·酈生陆贾列传》,均为日本石山寺旧藏^①,注文双行小字加于正文之中。《集解》夹注本《史记》当为六朝后期始较为常见。这种情况一方面固然与影响较大的注家多为六朝以后学者有关,另一方面,也因为当时的精抄本尚不易得,故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抄写本文。

俄藏《史记》残片虽然存字不多,但其中俗字占了相当比例,如“节”作𦵑,“逆”作𦵑,“顾”作𦵑,“器”作𦵑等,多为写本中所常见。值得注意的是

Дх. 04666 残片中“无”,作𦵑,在敦煌文献中暂未发现此字形。而与之最为接近的是《魏廉富及天长造义井佛像记》,作𦵑^[11]。此与魏碑写法相近的现象,也从一侧面揭示了该残片抄写的地域特征。

小 结

俄藏敦煌文献 Дх. 02670 及 Дх. 04666 残片将现存《史记》古写本的时间至少提前近两百年。写卷不仅给我们揭示出《史记》文本在早期流传过程中的一些文献问题,更让我们领略到晋末北方《史记》写本的神采,吉光片羽,弥足珍视。

参考文献:

- [1] 荣新江.《史记》与《汉书》——吐鲁番出土文献札记之一[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41-43.
- [2] 孟列夫,主编.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下册[M].袁席箴,陈华平,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462-463.
- [3] 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俄藏敦煌文献:第1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92.
- [4] 司马迁.史记:卷87[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561.
- [5] 藤枝晃.汉字的文化史[M].李运博,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 110.
- [6] 郭沫若.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J].文物,1972(8): 2-6.
- [7] 孟列夫.前言[M]//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俄藏敦煌文献: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
- [8] 贺次君.史记书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 4.
- [9] 易平,易宁.六朝后期《史记》版本的一次重大变化——六朝写本《史记》“散注入篇”考[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7卷,2006: 56-62.
- [10] 魏收.魏书:卷101[M].北京:中华书局,1995: 2245.
- [11] 秦公,刘大新.广碑别字:第2册[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 333.

① 此二卷1918年罗振玉有影印,收入《海东丛残》,贺次君先生《史记书录》中均题为“高山寺藏”,误。参贺次君《史记书录》,第1—3页。